

经济演化解释的理性基础分析： 基于适应性理性

王越子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74)

摘要: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会有不同的理性范畴的内涵界定。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通过牛顿经典物理学隐喻建立起来的均衡分析,其理性基础实际上就是忽视了过程和时间分析的实质理性。演化经济学侧重于被新古典理论作为背景因素的过程分析,其理性基础是程序理性。构建作为过程或程序理性的适应性理性,是对着眼于实质理性的完全理性或“程度”层面的有限理性的拓展,并且适应性理性是本体论意义上解释社会经济演化现象的理性基础。

关键词:完全理性;有限理性;适应性理性;本体论;演化解释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07)01-0026-05

一、经济学中的理性分析:视角的重要性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理性是个重要但又难以界定清晰的概念。早期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都有其理性范畴:哲学家认为理性是人类的认识能力;心理学家认为理性是指认知、推理或问题的解决过程,以区别于非理性;社会学家用理性来表示组织目标的自觉适应性;经济学家用理性表示靠抉择过程挑选出来的行动方案的属性。汪丁丁指出,把握理性概念的内涵,必须将其置于具体的思维传统中,如亚里士多德传统、奥古斯丁传统、苏格兰启蒙传统等等。同时,即使是同一思维传统内部,对理性概念也有不同的理解,如哲学意义上的理性,就有欧洲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欧洲大陆传统中的理性,是对人性的超越;强调理智对情感的克制,代表人物有柏拉图、康德等;英美传统中的理性,把理性回归到人性,强调感觉、意志甚至激情对理性的作用,代表人物有亚里士多德、洛克、休谟等。由此可以看出,理性分析的立场或视角,对界定理性范畴的内涵,显得极为重要。

就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概念而言,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方兴未艾的演化经济学,理性范畴本身是不断演进的,从而有其特定内涵。如前所述,对经济

理性范畴的分析,首要的问题就是确定何种立场或视角问题。在本文看来,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我们不能仅仅从人的认知程度层面将其理解为对抉择行为本身的实质理性。相反,理性还有其他的表征形式,如程序理性。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通过牛顿经典物理学隐喻建立起来的均衡分析,其理性基础实际上就是忽视了过程和时间分析的实质理性,而演化经济学侧重于被新古典理论作为背景因素的过程分析,其理性基础显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实质理性。那么,我们如何构建经济演化解释的理性基础呢?

在通常的经济学语言中,演化是指渐进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因而,“经济过程的路线不再被假定为是在‘事物的自然状态’中被预先确定的或者是由某些神圣的造物主设计出来的^[1]”,在演化过程中,行为主体一方面是“规则遵循的”,受习俗、惯例等方面的制约;另一方面,行为主体作用于外在约束而不断改变外在约束,从而具有建构性质。这两方面交互作用,构成了行为主体对约束条件的主动性适应。基于以上理解,本文在有限理性分析基础上,建构了适应性理性范畴。借助于这个范畴,我们可以从本体论意义上解释社会经济演化现象,它是本

收稿日期:2006-11-25

作者简介:王越子(1978-),男,湖南华容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产权理论研究。

体论的演化解的理性基础。

二、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理论演变

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人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居勒尼学派和享乐主义的哲学家伊壁鸠鲁。但是,直到17世纪欧洲理性主义运动,经济学家才开始系统的对抽象经济人的思考。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了“自私自利”的“经济人”的基本含义。他指出,“我们每天所需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2],并且斯密将行为主体的自利原则和社会丰裕原则结合起来。他认为,“人们(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从而“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行为会导致整个社会丰裕”。在斯密看来,人们之间的互惠交易行为主要受到道德理性的指导^①,它是人的本性禀赋,是一切情操的总和,表现为同情、反感、良心和责任感这些感觉,并以“生物的形象”来影响每个人的行为。因此,斯密的经济人理性分析是基于道德理性范畴的。

但是,自斯密以后,工具意义上的理性逻辑演绎方法逐渐成为主流,以先验地完全理性与最优化原则为假设的“经济人”范畴,逐渐占据了经济分析中的主导地位。李嘉图主张从纯粹假定的思想原则出发来演绎客观存在的具体^②。西尼尔认为经济理论家是从经济学的“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出发并演绎出各种理论体系的^③。斯图亚特·穆勒将西尼尔的“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加以系统化,形成了“经济人”概念的雏形。同时,他主张从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中抽象出人的经济行为来进行分析,进而采用演绎方法。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人”概念。与此同时,边际革命进一步强化了经济理性主义的以“效用最大化”为思路的“经济人”概念,从而将纯粹理性抽象演绎方法推向了新的极端。

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家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他们认为理性是利润和效用最大化的代名词。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人”具备其所处环境的完备知识,而且即使这些知识是不完全的,至少也是相当丰富、相当透彻的。此外,这种人还被设想成为具备很有条理的、稳定的偏好体系,并拥有很强的计算能力;他靠这种能力能从备选方案中进行最优选择^[3],也即“经济人”具有能

够评价各种措施结果的某种价值体系的“效用函数”或“优先选择的次序”的能力,这种函数和次序是“经济人”将所有的结果按照其最愿意出现或最不愿意出现的次序加以排列,并进行最大化选择。在这些理性假设前提下,借助边际分析的数理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家逐渐构建了一个逻辑优美、结构严谨的理论大厦,全面论证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原理。

由此看来,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范畴,具有先验性质,是一个为了分析问题而建构起来的工具性假设和逻辑结构。“它抽象去与它所研究旨趣不相关的、次要的因素而构成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是符号哲学中所说的能指而非所指”^[4]。

早期制度学派长期以来把传统的理性最大化假定当作抨击的主题。从凡勃伦、米契尔以及康芒斯时代到现在,他们都坚持认为习惯、规范以及制度在引导人类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人类是“规则遵循的”,而不是理性最大化的。凡勃伦批判了正统经济学将人作为“快乐和痛苦的快速计算器”的概念,指出人是积极存在的,并通过习惯来进行活动,从而不受到理性的逐案计算所引导。受凡勃伦的影响,米契尔抨击了正统经济学的理性计算假定高估经济生活中的理性成分。他指出,理性甚至经济理性并不是人类的根本天性,而是“一种后天的才能——而不是复杂的理论结构可以立即建诸其上的牢固基础”^[4]。康芒斯和克拉克同样不接受理性最大化概念。他们认为人类行为是习惯性的,并不是以逐案最大化计算为基础的。弗兰克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理性选择模型的朴素描述中所隐含的收集信息、进行计算的工作大概要花费超过任何一个人一生的时间和精力。而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靠习惯和拇指规则来做日常决策的。由此看来,早期制度学派是反理性主义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老制度主义者是将理性概念也一起剔除掉的^[5]”,他们既希望摒弃最大化思想又不愿完全丢掉理性概念。在此,克拉克的分析很具有代表性。他指出,只有借助作为人类本性的“静态成分”的习惯,“边际效用原则才能在现实生活中近似成立”,“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做出既省力又明智的选择,体现出深思熟虑或没有决策伴随成本的经验,而决策成本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定会使最理性的享乐主义者达不到享乐主义的最佳境界。

习惯是自然的机器,它总是把先由自觉审慎的较高级器官承担的工作移交给较低级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去做^[6]”。正如卢瑟福指出,“对老制度主义者而言,这种习惯性的规则遵循行为与正统的理性最大化概念颇有抵触,但理性并没有被取消^[7]”,只不过是不同理论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新制度经济学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的内在缺陷并力图超越新古典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姆森指出,人类理性受到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行为主体自身接受信息的能力等因素的制约,因此人类理性是一种处在以预期收益最大化的“强理性”和有组织的理性的“弱理性”之间的“中等理性”状态的“有限理性”。基于这种认识,威廉姆森认为有限理性是缺乏完备契约的原因,也是对认知能力要求不高的等级控制形式替代市场交易的原因。哈耶克同样指出,标准的理性假定高估了人所具有的“理智力”,低估了他们活动于其中的社会领域的高度复杂性。个人面临普遍的不确定性和无知,而规则是被利用的手段,人们利用规则是“因为我们的理性不足以把握复杂现实的全部细节”。

随着行为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心理学的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西蒙详尽而深刻地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理论的致命弱点:(1)它对目标和价值的内容保持沉默;(2)它假设行为的全局一致性;(3)它假设“一个世界”——行为针对它的总环境是客观理性的,包括参与者随着时间流逝而面对的当前和未来的环境^[8]。由此,新古典理论的核心假定在西蒙看来都是不确切的,进而他提出了有限理性论^⑤,其影响因素包括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关备选方案的不完全信息以及成本函数或其他环境约束极其复杂性等。当然,西蒙的要点不是说理性不在场,而是说由于认知的限制,理性是有限的。人们没有能力用最优的方法解决复杂问题。他们所做的是建立易于把握和遵循并发挥相当作用的决策规则。

纳尔逊和温特在分析企业惯例时广泛使用了“有限理性”概念。他们指出,由于现实生活的决策问题太复杂,太难以把握,企业不可能从所有可以想象到的选择方案中找出符合最大化要求的方案。相对简单的决策规则和程序于是就被用来指导行动;由于存在有限理性问题,这些规则和程序不可能太复杂,在它们反映考虑信息和决策成本的普通

计算结果的意义上,也不可能具有‘最优’的特征。但是,正是这些规则和程序,构成了企业行为和决策的根据,它们是企业组织的“基因”类比物,纳尔逊和温特将其称之为企业惯例。在他们看来,惯例能够提供经济的“自然选择”赖以发生作用的稳定物质,它们是准自动的、有惰性的,并不像最大化理性选择所涉及到的深思熟虑和有意识的意志那样。

批判地审视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的理论发展脉络,我认为斯密对经济人范畴的理性分析,是基于道德理性的,他对自利原则引致的社会丰裕的分析,暗含着“自然秩序”及其竞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忽视了建构理性的作用;早期制度学派低估了理性选择的作用,而且把行为视为外生给定的习惯、规范以及制度的结果而落入行为主义的窠臼;新制度经济学借鉴有限理性范畴,力图实现对新古典完全理性假设的突破,但它并没有动摇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的内核——因为新制度经济学将行为主体的认知能力的差异归结为信息成本,即在新古典经济学预算约束的基础上,增加信息约束。因此,新制度经济学仍然遵循最优化分析,只不过是“理性”增加了一个约束条件而已。那么,要想真正超越现有的经济学中的理性分析,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概念和范畴建构?

三、基于有限理性的适应性理性:一个拓展

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的理论嬗变,为我们进行理论拓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由前文对现有理性分析的批判性审视引致的“问题意识”,使得我们对理性的解读、阐释和重构,不能仅仅停留于“程度”层面上。换言之,人们不可能穷尽对世界的认识,因此,从“程度”层面来区分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本身就是个“伪问题”或“伪理论”。

事实上,有限理性和完全理性不仅仅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还有其他更为实质的方面。正如西蒙指出,“理性有时指运用才智进行抉择的过程,有时则指抉择本身^[9]”。新制度经济学从人的认知程度层面理解理性,实际上就是指抉择本身的属性。那么,我们能否说明抉择过程的理性呢?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在西蒙“有限理性”理论基础上,重新界定了另一种理性形式,即适应性理性。它是对西蒙“有限理性”理论的拓展,并表征为程序理性^⑥。

适应性理性是指在外在和内在约束条件下,行为主体不断调整自身抉择行为以适应约束条件并能

动地影响约束条件的理性形式。这种界定综合了达尔文主义和拉马克主义的进化思想,即适应性理性下的主体行为一方面是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结果,受到外在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主动地作用使其作用于约束条件,而不是被动地适应约束条件,如新奇创生突破技术和市场的限制等。因此,适应性理性既不是行为主体与生俱来的天性,也不是行为主体通过后天学习和模仿得来的,而是在外在和内在约束条件下不断适应及其演变形成的。在此,适应性理性是一种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而非结果理性(实质理性)(Rationality of outcome/product)。

事实上,实质理性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观主义的逻辑推论,这种推论是通过偏好和禀赋的外生分布假定,并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展开分析而忽视了人类行为活动的时间和空间特征,从而忽视了行为的形成过程的分析。针对新古典经济学这种缺陷,西蒙深刻指出,主流的经济学家“一般用理性一词表示靠抉择过程挑选出来的行动方案的属性,而不是表示抉择过程的属性^[10]”。为此,西蒙主张着重考虑行为的形成过程的程序理性分析,并运用“适应”范畴去解释行为的动态形成过程。在他看来,无论是生物进化,还是人类的行为,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系统达到最优状态,它只能是适应,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最优的。因此,人类是在适应环境中发展,人们的有限理性是为了适应环境的需要,是有效适应,是在一个错综复杂、不断发展的世界上求得生存的方法。因此,理性同样可以运用适应性术语来解释。本文将这种有限理性界定为适应性理性,它是对行为在给定条件和约束下适于达到给定目标的“实质理性”的一种批判性解说。正如卢瑟福指出的那样,“适应性理性仍然包含以行为选择过程的后果为基础的评价和决策,但它的信息和认知要求较低”^[11],即不需要全智全能的完全理性。按照本文界定的适应性理性范畴,我们可以逻辑推导出有限理性主体的行为特征,即人们在外在的环境中,根据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运用一定的程序和方法寻求次优方案和满意方案,以适应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适应是一种动态的适应,是一种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的适应。并且,“这种适应性极其缺少经济理论所假定的那种最大化理性性质”,“尤其是,根本不必给生物(包括人类)假定一个效用函数,也不需用于计算不同需要之间边际替

代率的任何精致程序”^[12]。

至此,我们很容易地看出基于目的论、简化论、还原论的实质理性和基于演化论的适应性理性(程序理性)之间的理论或方法论分野。前者是基于建构理性的,后者是基于演化理性的。当然,演化理性和建构理性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区分。它们可以进行创造性地转换与综合。同时,从更宽广的视野看,适应性理性分析张扬了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学术传统相对立并且有可能成为21世纪经济学策源地的演化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新奇创生。

四、作为本体论意义的适应性理性与演化解

实际上,对经济学分析中的理性的多视角解读,可以是基于认识论的,也可以是基于本体论的。如果从人的认知程度的有限性及其相关约束条件来考察作为行为抉择本身属性的理性,则属于认识论范畴;如果从经济的演化过程来考察新奇创生及其多样性的程序理性,则属于本体论范畴。具体到本文,适应性理性范畴是属于本体论意义上的。这是因为,适应性理性侧重于程序(过程)分析,特别强调“不确定性和累积的发散和可能,而不是收敛和均衡^[13]”,从而将分析视野转向了新奇实现以及多样性的特征。

那么,作为本体论意义的适应性理性如何与演化解联系起来呢?霍奇逊指出,演化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的学科界限,首先在于本体论标准,即是否承认新奇及其多样性。劳森认为,演化的经济社会本体论思考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关键性的。贾根良指出,“对演化经济学家来说,一个较普遍的共识已达成:演化解释内在地不是生物学解释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14]”也就是说,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演化现象的解释,必须是基于本体论的。那么,本体论解释的理性基础是什么呢?是完全理性抑或有限理性?在本文看来,适应性理性可以解释本体论意义上的新奇突现等演化现象。因此,适应性理性是经济演化解的理性基础。

总之,经济学在发展,关于人类理性的研究也在发展。借鉴生物学的演化分析,本文在现有的经济学理性分析基础上,建构出了适应性理性范畴,它能够为我们分析主体行为抉择过程中的理性提供一个更具说服力和现实性的思路。当然,本文的分析并不是完全否定传统“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只是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以期经济学中的理性假

定和以理性假定为基础的发展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严谨。

五、简要结语

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是实质理性的,而经济演化解的理性基础是适应性理性的,它是一种程序理性。本文认为,对经济分析中理性范畴的解读,必须基于特定的视角。不同视角下的理性分析都有其存在的依据和合理性。这样看来,经济学运用理性分析,本身并不存在对错问题,只存在如何选择视角和如何运用理性的方式问题。正确的经济学理性主义应当慎重地运用理性分析,必须区分不同视角下的理性分析的优点和缺陷。本文并不是反对经济学运用理性,而是反对唯经济学理性主义中的理性滥用^⑦。比如,主流的新古典理论夸大了理性假设的逻辑意义,并上升为一种思维因素,从而筑起了现代经济学唯理性主义方法论的巢臼,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注 释:

- ①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详细地阐述了道德理性及其本质内容。因此,主流的新古典经济人范畴并不是以斯密的理论为基础的。相反,它是先验性质的建构理性的经济人范畴为基础的。
- ② 这种方法被熊彼特称为“李嘉图恶习”。
- ③ 西尼尔采用的分析方法,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唯理性认识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同构性质。
- ④ 转引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 ⑤ 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范畴是阿罗首先提出来的,

他认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诺思将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理解为(1)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导致人们面临着不确定的世界(2)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因此行为主体不可能是全智全能的。

- ⑥ 经济学中的理性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那么,对理性的分析就可以从实质理性和程序理性来进行。这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
- ⑦ 哈耶克将理性滥用称为“科学的反革命”。

参考文献:

- [1] 杰克·J·弗罗门. 经济演化——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M].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3.
- [2]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14.
- [3][9][10][12] 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6,4,29-30,43.
- [4] 余章宝,杨玉成,经济学的理解与解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95.
- [5][6][7][11] 马尔科姆·卢瑟福. 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67,73,74,66-67.
- [8] 西蒙. 西蒙选集[M].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338.
- [13] G·M·霍奇逊. 演化经济学的诸多含义[A]. 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卷(第2辑)[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41.
- [14] 贾根良. 演化经济学与达尔文主义—文献述评[A]. 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卷(第2辑)[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95.

(责任编辑:许桃芳)

An Analysis of the Rationality Basis of the Explanation of Economy Evolution: Adaptive Rationality

WANG Yue-zi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Sichuan 610074,China)

Abstract: Differ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come with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for the rationality category. The equilibrium-analysis method of the mainstream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hat is based on the Newton classic physics metaphor, actually takes on the rationality of product as its basis, which ignores process and time analysis. Evolution Economics, which puts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process analysis that is hold as a background factor by the neoclassical theory, however, takes procedure rationality as its rationality basis. The building of the adaptive rationality that acts as the process or procedure rationality is an extension of the full rationality which is rationality-of-product-oriented or the bounded rationality which is of an extent-level. Moreover, adaptive rationality also serves as a basis of the explanation of the social economy evolution phenomena from an ontological perspective.

Key words: full rationality; bounded rationality; adaptive rationality; ontology; evolution explanation